變色的台灣新聞媒體

●盧世祥／資深新聞工作者

總部設於巴黎的「無疆界記者組織」（RSF）2月中旬發布報告，指中國利用其經濟影響力，損害香港、澳門與台灣媒體的獨立自主。按這一報告的「2014年全球新聞自由指數（Press Freedom Index）」排名，台灣在一百八十個國家或地區居第五十，比前一年的第四十七下降。更值得注意的，報告點名親北京的旺旺集團收購「中國時報」系，正對台灣新聞自由構成威脅。（參見附件一）

台灣新聞自由受到威脅，已經不是「新聞」。除了RSF，每年4月底向例發表觀察報告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一年前在報告中指台灣新聞自由全球排名第四十七（附件二），於2012年總統大選時，「觀察者注意到在中國和台灣擁有龐大事業的企業大亨取得媒體市場更大的控制，引起記者、學生和社會運動者的抗議，擔心台灣的多元化受到威脅。」「自由之家」由美國羅斯福總統夫人艾琳娜（Eleanor Roosevelt）創立，是總部設於華府的非政府組織，致力推倡自由、人權、民主於全世界。

這兩個知名國際組織長期觀察世界新聞自由，從它們的報告，可以看出台灣的新聞自由，有幾項發展與特質值得關注。

首先，台灣經歷民主化過程，新聞媒體有充分自由，已無庸置疑；其自由程度，在全球排名約居前三分之一，較東亞鄰邦且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新聞自由與民主一樣，都不是理所當然只進不退，在我們這種從威權轉變未久的新興民主國家，只要轉型正義未竟其功，新聞自由與民主都可能倒退。最受關切的，中國近年加緊對台灣統戰工作，新聞媒體是重點目標，馬英九政府向中國一面倒，正提供中國影響台灣新聞界的便利管道；近墨者黑，中國以箝制新聞自由舉世惡名昭彰，台灣新聞的自由、多元、自主，都正受影響而倒退。

新聞自由至關緊要，是維繫民主的支柱。媒體報導並解釋新聞，設定議題，形塑社會價值，特別是大眾傳播媒體，常為社會許多人資訊、常識或知識的來源；在自由環境中善盡「守門人」職責的媒體，為確保公民耳聰目明、理性抉擇的要件。獨立、自主的新聞界自由運作，因此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基石。

從新聞媒體的角度說，新聞自由有幾個內外在敵人，分別是：政府、政客、商人、

媒體自身。

以外在而言，政府常是新聞自由最大阻力。媒體有監督政府的基本職責，角色截然不同，以致兩者總常處於對立面。同時，媒體監督政府，較諸三權分立的政府部門之間制衡，其密集與嚴厲程度猶有過之；民主國家的政府和政治人物容或尚能以「諍友」待之，不民主的政府必視媒體為統治的阻力，力圖威逼利誘以令其為統治工具，或直接以制度暴力箝制之。

政客、商人與媒體有錯綜複雜的供需關係，新聞工作者若不能正確處理政商關係，必使新聞自由成為犧牲品。政商界是新聞資訊與廣告營收的提供者，總期待媒體「隱惡揚善」、「報喜不報憂」，這與新聞記者獨立自主、準確平衡報導真相的天職常有衝突；籠絡與腐化因此常是政商人物應對媒體的手段，必不得已則偶爾訴諸法律，以嚇阻負面資訊曝光擴散。從而，若媒體未能與政商保持適當距離，新聞自由不免七折八扣。

不過，新聞自由最不容輕忽的阻力，仍是媒體自身。新聞自由係符合人性的普世價值，其外在阻力或敵人，總名不正言不順，容或一時或對少數人可能得逞，卻難長遠持久；即使以國家體制強力脅迫，必受國際社會譴責。況且，新聞不自由的環境，成就不了文明社會，也難以建構令人尊敬的國家。

就實況觀察，台灣新聞界特有的唯我獨尊、唯利是圖、唯我族群或「三唯文化」，最傷害新聞自由。台灣在威權時代，黨國當局長期箝制媒體，既壓制新聞自由，也不容許媒體新設，其惡例罄竹難書。政治民主化過程，黨國當局1988年解除報禁，九〇年代容許廣播、電視民營新立，新聞媒體才得以打開桎梏，奔向自由。二十多年來，媒體在自由的環境競爭發展，活絡多元自不在話下，卻同時衍生「三唯文化」，社會公器作用未見充分發揮，公害顯然可見，不但不利台灣民主政治長遠發展，也無益新聞自由進一步提升。

實質言之，媒體唯我獨尊，導致如今社會「第四權最偉大」。政府權力尚有分立監督機制，以「第四權」自居的媒體，卻幾乎不受制衡，且常視自律為無物：新聞倫理規範不行，報導出錯絕少更正。另一方面，媒體雖目中無人，眼睛卻可為金錢利益大開，只要有利可圖，倫理與格調都可出賣。於是，新聞處理以增加發行和收視率為最高考量，煽色腥與混淆新聞廣告界線的置入性行銷大行其道；不少媒體有奶便是娘，且已到了不問奶頭來自財團、政府或對岸中國的地步。至於族群因素，媒體作為意識形態的產製工具，威權時代是維持少數統治的利器，向由外省族群主控，即使進入民主時代，這一格局未改。媒體因族群因素而意識形態掛帥，對新聞自由與自主都是重大傷害。新聞界出身的評論家金恆煒一段話描繪得最貼切：

「…政黨輪替的2001年之後，《聯合報》社中外省人與本省人之比是八〇比二〇，《中國時報》則是六五・六比三四・四，戒嚴時期可知。兩大報老闆爭相競

逐中常委，一切以黨國利益為主。《聯合報》在七〇年代一度經營不善，尋求王永慶的財務支援，錢下去了，也派人進駐，蔣經國卻阻斷王介入媒體，因為台灣人可以做生意，不可染指媒體，王永慶只好認賠退出。只此一例，就看出『族群』政治的利害。

「也就是說『國家機器』以及『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不容落入本省人手中，台灣的『族群政治』在每個領域中全都顯現。…」[1]

觀察台灣新聞自由，因而必須從影響它的上述幾個要素切入；尤其自媒體解禁邁向自由化二十多年來，環境的改變實質影響了新聞自由的形勢，主要有幾項發展：媒體競爭、政黨輪替、中國崛起。

解禁以來，台灣媒體競爭有增無已，先是報紙之間的戰國時代，繼之以電視激烈競爭，近年又有網路媒體興起。媒體多元呈現，競爭日甚，「三唯」中的唯利是圖當道，只要有利可圖，新聞自由、自主、獨立等隨民主化而來的要素皆可拋。

政黨輪替是民主化的新生事物。不同政黨當政，新聞自由受其政策作為影響而有差異。中國國民黨是列寧黨，黨國當局把新聞媒體視同統治工具，民主化的台灣雖讓近年主政的馬英九黨國體制顧忌較多，它威逼利誘的基本手法不變，且具體表現於馬政府置入性行銷、以司法案件對付異議者。相形之下，民進黨具「民主」、「進步」屬性，執政八年，朝小野大，爭取輿論唯恐不及，陳水扁當總統曾言「寧要新聞自由、可以犧牲國家安全」。從而，新聞自由在綠營執政，不論按「無疆界記者組織」或「自由之家」觀察評比，都優於馬黨國時期。

必須強調，不少媒體面對馬政府時自我限縮監督天職，既有物質層面的唯利是圖，也因出自「自己人」的唯我族群；「兩唯」相加，新聞自由、自主更受傷害。另一方面，馬黨國對待媒體親疏有別，對友好者挹注廣告資源不遺餘力，其不友好者則常以更正或官司伺候。如此差別待遇，當然影響新聞自由。

台灣媒體因此從民主化至今，藍大於綠的基本色調不變。就在此時，中國加緊對台灣工作，又為台灣的媒體注入赤紅色調。本來，在兩蔣時代，執行以反共為基調的政策，中國對台灣媒體戰難以開展；如今馬黨國向中國一面倒，政治上紅藍麻吉交流，有些媒體同樣紅藍合體，在反獨促統共同目標之下，中國因素成為衝擊台灣新聞自由的新現象。

國共同屬列寧黨，對媒體都極力控制，差別只在共產黨更極權；中國被指為網際網路公敵，領導人名列新聞自由掠奪者，就是例證。台灣在馬黨國之下，新聞自由不進反退，中國的手伸進台灣新聞界，新聞自由必更明顯倒退，且為現在進行式，這也正是國際人權團體近年所不斷警告的。

中國把手伸進台灣新聞界，主要不外收買、交流兩個途徑。

收買台灣媒體，手段或由中國自己來，或透過中國台商等各種代理人進行。中國直接挹注廣告資源收買台灣媒體，從馬英九上任以來，公開且積極，前此偷偷摸摸進行的，因馬政府縱容而公然為之。

監察院2010年11月通過糾正行政院陸委會的調查報告最具代表性。報告指中國官方以「專輯」方式，在我國報章刊登大篇幅廣告，違反現行法規；陸委會怠於查處，無法管理這類假專題的真廣告，任憑中國新聞置入橫行氾濫。監察院還明確指出，旺旺中時在中國的公司直接招攬其官方廣告業務，再轉包給聯合報等媒體。

以置入性行銷打入台灣媒體，配合當時眾多中國省市地方官員前來訪問而大肆進行，廣告內容以吹噓各省市建設為主，兼以招商、吸引觀光旅遊。值得注意的，讓這種以「專輯」、「廣編」為名，甚至直接嵌入新聞報導的廣告，見諸各種媒體，成為中國影響台灣新聞界的直接途徑。其中，有如監察院報告所指出，報紙主要見諸聯合、中時兩報。相形之下，自由時報的台灣主體堅持和蘋果日報的反共立場，都讓中國收買新聞界的置入性行銷難以打入。

至於透過代理人收買台灣媒體，以在中國有龐大利益的生意人最顯著。從食品業起家的蔡衍明併購中時集團，2009年成立旺旺中時集團，他的生意與中國密不可分，也不惜在六四事件等為中國當局辯解，近年爭議甚大。以經營手機著稱的王雪紅，2011年入股香港廣電TVB，它在台灣也有具份量的TVBS（聯意製作）衛星電視。次年，王雪紅在總統大選關鍵時刻力挺馬英九連任，宣稱自家的HTC是中國人的品牌，被視為向北京表態。今（2014）年3月，美國在台協會前處長司徒文（William Stanton）在台灣清華大學演講指稱，台灣的新聞自由與中國、香港「同步惡化」，其肇因與「無疆界記者組織」、「自由之家」所強調的並無二致，就是親中國的生意人收購媒體。

中國直接出手，還見諸2013年12月的「兩岸媒體前瞻論壇」。這一會議由負責統戰的政協主席俞正聲參與，達成「六大倡議」，促進雙邊媒體交流。與其他「兩岸論壇」一般，這些場合都是中國近年加緊對台灣工作的一部分，目的在透過交流，提出「倡議」、「共識」等結語，以爭取並套住新聞、財經、智庫、政治、宗教等各界人士。

中國對台灣媒體的工作，是它輿論戰、心理戰的必要工具，成效已然展現。

受中國影響，司徒文點出了台灣媒體的新聞向中國傾斜、議題單一及新聞自我審查等現象。實務上，新聞用語、內容、角度、觀點已逐漸出現「中國化」：「內地」等用語見諸若干媒體；中國的負面新聞，不堪的人權紀錄、迫害異議人士、經濟統計造假，刻意淡化或竟略而不提；中國的正面訊息，如軍力武器崛起、經濟超日趕美、對台灣政策措施，則照單全收。更嚴重的，以中國觀點看待國際問題，在評論釣魚台事件、日本政經情勢、美國重返亞洲政策等新聞事件，不但站在北京角度，其偏激程度甚至超越中

國憤青網民。尤有甚者，台灣出現以修理中國眼中釘台獨人士、民進黨中央為常業的媒體。

引發學生佔領國會的「服貿協議」如果實施，出版和廣告業開放，將為中國掌控台灣媒體增添動力，新聞自由江河日下，可以預見。香港成為中國一部分之後，言論自由限縮，3月初有上萬人走上街頭，聲援遭暴力襲擊的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為香港新聞自由沈淪增添註解，足供台灣引以為戒。

【註釋】

1. 金恆煒，〈台灣族群政治探源〉，《當代》，第229期，2006年9月號，頁40-46。

【附件一】「無疆界記者組織」觀察台灣新聞自由

年度	2014	2013	2012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評分	23	23.82	13	14.5	15.08	8	10	10.5	12.25	14.25	12	9
排名	50	47	45	48	59	36	32	43	51	60	61	35

* 評分越小，新聞自由度越大；關注排名，亦宜留意評分。
* 2012年評比含2011～2012年。

【附件二】「自由之家」觀察台灣新聞自由

年度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評分	25	25	25	24	23	20	20	20	21	23	24	21
排名	47	47	48	47	43	32	33	35	44	50	55	41

* 評分越小，新聞自由度越大。◆